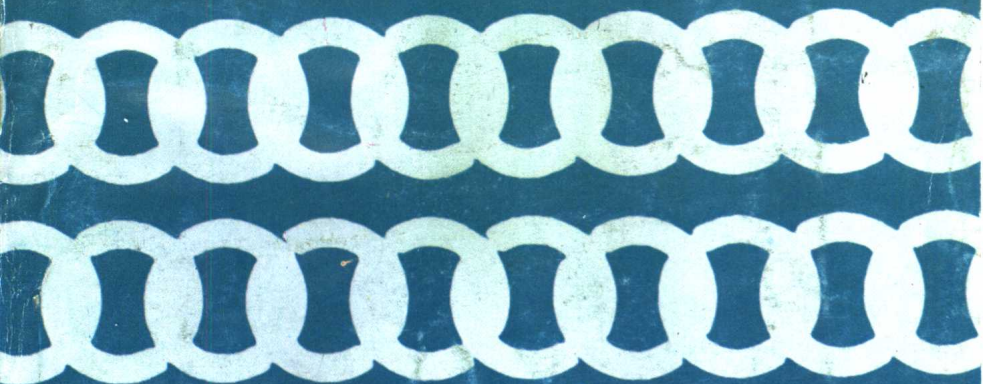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史丛书

人的大写

—中国史传文化

李祥年



203

-77

沈阳出版社

人的大与

——中国史传文化

李祥年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一、混沌初开的人文	(1)
二、人学与经学	(13)
三、司马迁与正史传记	(36)
四、降大任于斯“人”	(67)
五、杂传说“杂”	(81)
六、构筑人性的七宝楼台	(106)
七、史传文学的文化底蕴	(119)

一、混沌初开的人文

有这样一则美丽的神话：说在悠邈的亘古，天地混沌一团，犹如一个鸡蛋，盘古便生在其中。经过了一万八千年的漫长岁月，阴阳始分，阳清而为天，阴浊而为地，天地之间的盘古则一日九变，他是天上的神，地上的圣，天每日升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丈，盘古便也日长一丈。如此又经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已极高极高，地也极厚极厚，盘古也成了顶天立地的神圣。后来盘古终于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的身体在垂死之际又开始变化。这一次，他的气息化成了风云，声音化成了雷霆；左眼化为了太阳，右眼化为了月亮，四肢五体化为了四极五岳，血液化为了江河，筋脉化为了起伏地势，肌肉化为了田壤泥土，发髭化为了天上的星辰，皮毛化为地上的草木，齿骨化为金石，精髓化为珠玉，汗流化为雨泽，他身上的各种寄生虫也随风而化，成为最初的芸芸众生。

这便是著名的“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早在一千七百年前的三国时代，吴国人徐整便已在他的书中为我们记述了这

则神话。当然，^①这则神话在我国的流传年代无疑还要早出许多。

在没有发明文字以前，我们的祖先最初是用语言来构筑并向后人传递他们的历史的。最初的这种用语言构筑并传递的历史充分体现着童年期的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以及对人格化的神灵和伟大主宰的模糊观念和幼稚却又卓越的想象力。革命导师马克思把人类童年的这一想象力赞美为“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正是人类的这一“伟大成就”，为后来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实践的史传文学创作，投上了一道最原始的却也是最绚烂的浪漫主义光辉。

最早的记述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的艺术形式中，最常见的虽然应是那些用语言编造且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这些被保存下来的传说中的精华部分，后来被称作“史诗”。曾经有人认为，中国远古神话固然发达，然而却缺乏“史诗”的传统，没有一个如古希腊时期那样大量产生“英雄史诗”的年代，故而中国史传文化的浪漫主义源头相对说来也许并不那么深远博大。其实这种认识至少表明了对人类远古文明的某种误解。须知道，当人类尚只能如马克思所言“用想象和借助想象力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想象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时候，“神话”和“史诗”有时是很难加以区分的。“史诗”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历史的影子，它的故事主人公有些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依据的，然而就是在这些历史上所实有之人的身上

^① 徐整记“盘古开天地”及“化身事见《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记》和清马骕《绎史》卷一引徐整《五运历年记》。

又何尝不体现着童年人类的幻想呢？古希腊诗人荷马所创作的“英雄史诗”中的主角，哪一位不带有浓厚的神性？如果说中国的情况和西方有所差异，那么差异可能也只在我国上古时期的“神话”和“英雄史诗”往往更难划清二者之间的界限。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古代的许多神话传说在其流传过程中往往被涂上了历史色彩，另一方面，传述祖先事迹的历史传说也常常因人们的想象比附而得以“神化”。天上的“神”借助人们想象力的天梯可以来到人间，在人间创造奇迹，以至被某些氏族奉为始祖；同样，人间的“英雄”也在人们的幻想中插上了翅膀，升上天而化为了神灵。这种人神糅杂，交互转化的例子，在我国上古那些涉及祖先最初历史的传说中可谓比比皆是，下面我们仅举其中数则：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改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卷十七《大荒北经》）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理。”（《淮南子·本经训》）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同腹）生禹。帝乃命禹平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卷十八

《海内经》)

以上“神话”中的故事主角皆为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透过这些笼罩着极为神奇夸张色彩的故事情节，我们看到的是远古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之间斗争的那种惊心动魄。除此而外，还有大量的关于祖先们的发明创造的传说，如：

“有至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韩非子·五蠹》）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系辞下传》）

“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绎史》卷四引《周书》）

上述这些祖先传说亦无不掺杂着“神化”的内容。这使我们想起了黑格尔曾经在他的《美学》一书中对流传甚广的希腊神话中关于普罗米修斯窃火的故事所作的诠释，黑格尔说：“希腊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解释人类文化的每一步发展，并且把它表现在神话里，在意识里保存下来。”由此看来，以“神”和“英雄”的传说来概括并解释人类在最初的征服自然过程中的每一个进展与胜利，在筑建“神”和“英雄”的传说体系的同时也在构筑着祖先们自身的历史，这在世界的每一个民族，情形大体都是一样的。

由于种种复杂的时代与社会因素，尤其当战国以后，受到逐渐占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大量夹杂“怪力乱神”内容的祖先传说没有得到系统的保存，后人能够看到的，大多是一些零星分散地载录在各种古书中的故事片断，如

我国先秦时期的典籍《左传》、《国语》、《周书》、《楚辞》、《庄子》、《吕氏春秋》、《归藏》、《山海经》等中，都有大量的有关祖先传说的故事片断。正因为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多为片断式的，不具规模亦不成系统，因而产生了对中国是否有过“史诗年代”的怀疑，进而也忽略了远古“史诗”对中国史传文化的精神影响。

其实，还是有一些典型意义上的“史诗”被保存流传了下来的。当然，这些原本也是经由人们的口头诵咏的祖先传说在经过了文人或乐工的加工整理，在被赋予了“诗”的形式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理性因素，然而，它们所具有的幻想色彩的浪漫主义精神，却并没有因之受到掩盖。我们且来看一看收录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讲述周民族始祖后稷事迹的“史诗”《生民》：

原文

译文

厥初生民，

周族祖先谁所生？

时维姜嫄。

姜嫄娘娘有声望。

生民如何，

如何生下周族人？

克禋克礼，

祈祷神灵祭上苍。

以弗无子。

乞求生子后嗣昌。

履帝武敏歆，

踩了上帝拇指印，

攸介攸止，

神灵保佑赐吉祥。

载震载夙，

十月怀胎行端庄，

载生载育，

一朝生子勤扶养，

时维后稷。

就是后稷周先王。

诞弥厥月，

怀胎足月期限满，

先生如达。
不圻不副，
无菑无害，
以赫厥灵。
上帝不宁，
不康禋祀，
居然生子。

诞置之隘巷，
牛羊腓字之。
诞置之平林，
会伐平林。
诞置之寒冰，
鸟覆翼之。
鸟乃去矣，
后稷呱矣。
实覃实訐，
厥声载路。

诞实匭匭，
克岐克嶷，
以就口食。
艺之荏苒，
荏苒穉穉。
禾役穰穰，
麻麦幪幪，

头胎生子真顺当。
产门没破也没裂，
无灾无难身健康，
显出灵异和吉祥。
上帝原来心不定，
姜嫄娘娘有声望。
结果居然生儿郎。

把他丢在小巷里，
牛羊爱护喂养他。
把他丢在树林中，
樵夫砍柴救了他。
把他丢到寒冰上，
大鸟展翅温暖他。
后来大鸟飞走了，
后稷啼哭声哇哇。
哭声不止嗓门大，
声音满路人惊讶。

后稷刚会地上爬，
就很聪明又乖巧，
能够觅食吃得饱。
稍长就会种大豆，
大豆一片长得好。
种出谷子穗垂垂，
麻麦茂密无杂草，

瓜瓞嗒嗒。

诞后稷之穉，
有相之道。
蓂莪丰草，
种之黄茂。
实方实苞，
实种实褰，
实发实秀，
实坚实好，
实颖实栗。
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
维秬维秠
维糜维芑。
恒之秬秠，
是获是亩。
恒之糜芑，
是任是负，
以归肇祀。

诞我祀如何？
或舂或櫛，
或簸或蹂。
释之叟叟，

瓜儿累累真不少。

后稷种地种得好，
他有生产好门道。
保护禾苗勤除草，
选择良种插得早。
种粒渐白露嫩芽，
禾苗窜出向上冒，
拔节抽穗渐结实，
谷粒饱满成色好，
禾穗沉沉产量高。
定居邰地乐陶陶。

后稷推广好种籽，
秬子秠子是良黍，
糜子高粱秆株粗。
遍地秬子和秠子，
收割完毕堆垄亩。
遍地糜子和高粱，
挑着背着忙运输，
归来神前祭先祖。

说起祭祀怎个样？
有的舂米有舀粮，
有的搓米有扬糠。
淘米声音嗖嗖响，

烝之浮浮。
载谋载惟，
取萧祭脂。
取羝以軋，
载燔载烈，
以兴嗣岁。

蒸饭热气喷喷香。
祭祀大事同商量，
烧脂烧艾味芬芳。
肥大公羊剥去皮，
又烧又烤供神享，
祈求来年更丰穰。

印盛于豆，
于豆于登，
其香始升。
上帝居歆，
胡臭亶时，
后稷肇祀，
庶无罪悔，
以迄于今。

我把祭品装碗盘，
木碗瓦盆都用上，
香气马上升满堂。
上帝降临来尝尝，
菜饭味道真正香。
后稷开创祭祀礼，
幸蒙神佑没灾殃，
至今流传好风尚。^①

这首诗歌称得上是一篇较为标准的“英雄史诗”，从诗歌所歌述的周民族的始祖后稷由出生到长大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无论是对后稷的出生和长成，还是对于他日后的耕种稼穡以及祭祀上天，歌述者无不赋之以极为绮丽神奇夸张与想象。《诗经》中这一类歌述祖先事迹的叙事性“史诗”篇章尚有许多，如《绵》之叙述周之最初统治者古公亶父建立国家的故事；《皇矣》之叙述周大王、大伯、王季的功德和文王伐密伐崇的故事；《公刘》叙述后稷的曾孙率族由邠迁豳定居建邦的故事等等，都体现了这种想象神异的艺术特

① 译诗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程俊英《诗经译注》。

征，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详细例述。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一点，即远古史诗所具有的这种原生态的浪漫主义光辉，给于我们史传文化的发展以广泛而久远的照耀。我国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传巨著中分别记商族和周族的起源：

“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史记·殷本纪》）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史记·周本纪》）

《史记》中类似的记载亦为俯拾皆是，对此我们已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司马迁认识能力的局限，这里似乎还应有“爱奇”的太史公对先人的那份浪漫精神的向往以及无形之中所受到的感召吧。

文字的发明，使人类找到了较之语言更为永恒的保存并传递其自身历史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史”的概念应该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形成的。文字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是记事。在我国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刻字甲骨向我们展示了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人运用甲骨文字记载下的史事，内容有帝王及官僚的名字、战争、祭祀和狩猎、史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等。从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一种与“史诗”的瑰丽神奇的浪漫情愫所截然不同的简省与理性。有意

思的是，历史的“史”字，其造字的本意，确实也和记事有着直接的关系。“史”字的古文篆字作“𠄎”，许慎《说文解字》对“史”字的诠释是：“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里的“记事者”，学者们认为乃是书记之官，“又”字篆文作“𠄎”，象征一只右手，“中”为古文“册”的简写，右手持册，正是书记官的形象。

我国在殷周之际，史官制度已经日益完备，担当书记之责的史官的地位在当时已十分重要，统治阶级集团的誓、命、训、诰、重要历史事件、统治者的世系沿递和人物言论等等，都要由史官记载下来，作为重要文献藏之官府。书记之官的设置标志着史传文化开始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形态出现在人们的文化实践之中。《隋书·经籍志》言：“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以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又言：“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出时担负史官之责者，必须是一些博学洽闻之士。《隋书经籍志》对此亦有阐述：“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有了较之语言更为便利的工具——文字，有了被立为制度的更为完善的社会分工——史官设置，更有了一批较多沐浴理性光辉的博闻强识之人——史官，这一切，使我国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中原文化完成了向史官文化的转型。尽管这一时期的史官文化还不免带有原始

宗教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就其历史载录功能而言，已大大跨越了以口耳相传的“史诗”年代的夸张神奇，而向着简省谨严的自觉理性迈进了。这一渐趋理性的特征突出地体现在周代以来对人事的载述方面。周代史官所记人事，主要为帝王诸侯之事，这在当时，是由专人负责。的。所谓“周官五史”大史以下分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其中“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周礼》）便指的是专门负责记录帝王世系谱牒的官员。这类“谱牒”汉代人尚可以见到。司马迁就曾多次讲到他读这些言辞简略的帝王谱牒的感受。如《史记·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始终五德之传，古文皆不同，乖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

近代学者朱希祖先生曾撰《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在书中借用西方近代史学家的观点来阐述中国历史学的萌芽。其言：

“德国历史家郎泊雷希脱(Lamprecht)著近代历史学以为‘历史之发端，有两元之倾向，皆由个人之记忆，而对于祖先尤为关切。两元者何？即所谓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取自然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谱系，取理想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英雄诗。’推究吾国历史之发端，亦不外此例。然则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之谱牒，及春秋以前颂美祖先之诗，皆吾国历史之萌芽也。”

这里朱希祖先生把由“小史”所掌之谱牒，视为我国历史萌

芽重要的一元，亦足见这一简略记事形式的重要意义。“牒”作为物名，本是指小木片或小竹片，帝王身世谱系因书刻其上故后世以“牒”或“牒记”称之。“牒”和“简”一样，是纸张发明以前我们祖先用以载录文字的载体，由于它特有的空间局限，决定了它只能被录以最为简省的文字。当然，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讲，即使是千万支“牒片”串连起来，它绝无法和人类语言的无限空间相媲美。因而，“英雄史诗”中的那份夸张与想象在这里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也唯其如此，中国的史传文化还在其混沌初开的发源期，便于那神奇浪漫的“理想主义”元素之外，又注入了崇尚简朴与实录的现实主义精神。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任何一种精神倾向一旦形成以后，便必然会以其强大的历史持续力施于后代以深远而鲜明的影响。这种影响，即使是在中国史传创作的巅峰时期，亦丝毫未因为那些史传文学大师们的天才创造而有所掩盖。例如我们在被誉为中国史传扛鼎之作的司马迁《史记》中，便既可以看到仿效古时世系谱牒的形式而作的《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等一类撰作，同时亦可以看到充满着大量瑰丽神奇情节的“本纪”和“列传”诸篇。当然，如果这还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反映的话，那么我们再可以看到同一部以其著作的“不虚美，不隐恶，都谓之实录”的现实主义风格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又以其魅力无穷的浪漫主义精神得以“无韵之《离骚》”的美誉与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经典楚辞并称，这似乎更能够说明在原生态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那两种交互渗透的基本倾向——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在后代史传文化中的沿续与光大。

二、人学与经学

如果我们把中国史传文化的发展比喻为一条大河，那么在西周以前，人们所能见到的，还只是作为这条大河发端的那一道道涓涓细流，人们虽然能品味其对于中国史传文化日后发展的种种深远意味，然而，其自身尚不足以构成一道波澜壮阔的文化风景线。

大约在公元前 771 年，一支联合了西方少数民族的造反者队伍攻克了西周奴隶制王朝的首都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南），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第二年，幽王的儿子平王将首都东迁至洛邑（河南洛阳）。这一次的战争，标志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又一次历史性的变化。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亦即历史学家所称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铁制农具的制造和利用，农耕技术的发明和推广，空前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而来的是在社会上层建构中所引发的急剧动荡。原来的贵族社会等级森严的政治结构开始崩溃，王朝地位不断